

“高烧”的公务员考试透视



新热门 图/赵国品 新华社发



资料图片



XINHUANET

核心提示

被称为“中国第一大考”“国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逐年升温,今年更是进入“高烧”状态:统计显示,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通过审核的报名人数创纪录地超过105万人,比2008年增加20多万人;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8:1,与上一年的60:1相比,大幅增长。人们对“公务员热”并不陌生,而眼下“高烧”到如此程度,颇值得深思。在走访考生后可以发现,看似盲目的公务员考试热背后,其实是众多考生的无奈。

为就业,大学生加入“考公”大军

黑龙江省一省属高校经济学院金融专业的小王今年7月份刚刚大学毕业,因为年初考研失败,又一直没找到理想的工作,她今年也加入了报考公务员的队伍。

小王告诉记者,自己的大学同学有的顺利就了业,有的读上了研究生,而自己大学4年读下来却好像一事无成,读书、就业两头不沾边儿,心里很不是滋味。刚毕业时还经常和同学打电话聊聊近况,可几个月下来,总听见人家聊工作、聊越来越充实的生活,自己感到特别失落,慢慢就和大家疏远了。

大学毕业了却不能自食其力“赋闲在家”,这种状态让小王如坐针毡。思来想去,她还是报考了公务员考试做最后一搏。因为她给自己定下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目标,使得这次考试似乎比高考还要艰苦,心理压力很大。

小王说,她每天都会8点钟起床准时开始复习,直到晚上11点。虽然大学几年也是这么过来的,可因为心里承受着不准失败的重担,被压得异常疲惫,喘不过气。

更严重的是,因为自己长期没找到工作,小王家的家庭氛围也日趋紧张。小王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自不必说,父母也跟着着急上火,三口人经常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争吵。小王说:“我也很想就业,也能理解父母,他们期待我有一个高起点,希望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为了考试,小王先后上了两个公务员辅导班,各种辅导班也是一应俱全。虽然为考试尽可能做了充分准备,可招考计划一公布,小王还是傻了眼。因为学历是大学本科,专业又是金融,这些都严格限制了小王的报考选择。

“许多公务员的招考条件都提高了,不是统招硕士研究生根本不能报考,而且专业也限定得非常明确。”记者看了一下小王手中的某省公务员招考计划,个别热门的省直机关甚至要求报考者具备博士研究生学历。看来,要想考入这里的公务员队伍,没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难度的确非常大。

万般无奈之下,家住省会哈尔滨的小王最后选择报考了黑龙江省另外一个市的政府机关。报名截止后,发现这个岗位仍然是100多人录取一个的录取比例。小王将面临的,是同样激烈的竞争。

为跳槽,一些在职者“屡败屡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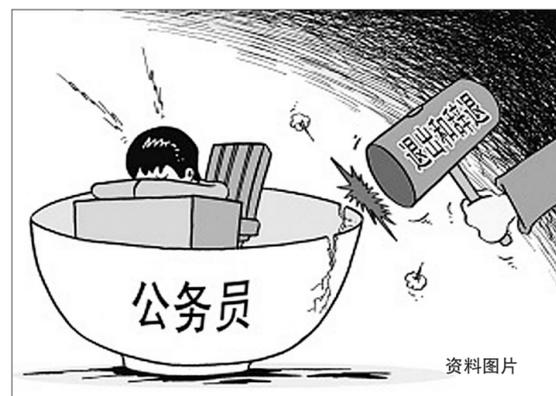
据了解,建立人才考试录用制度是我国在干部人事制度上革除陈规、锐意改革的重大举措。1994年6月《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

正式建立。随后,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工作实际又制定下发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和细则,形成了涵盖笔试、面试、体检、考核、监督等诸多环节的考录法规体系。

随着考试录用国家公务员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更多已就业者必须适应公务员“逢进必考”的规则,进入这支队伍必须通过相关考试,这无疑使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有所增加。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资格审查已经通过了,今年我还要考公务员,祝福我吧!”

这是今年7月从黑龙江一所高校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小周发给朋友的一条短信。小周曾在去年的公务员考试中失利,今年报名工作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新闻时评

林嘉祥案理顺社会情绪 需改良政治生态

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现在处于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林嘉祥党内外职务被免了,可说其人已经身败名裂。案件还在处置中,但民愤仍像火山一样持续释放着内在能量。

在此案件中,林嘉祥到底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职在警方。深圳警方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案件按治安案件处理,结论现已公布。可社会舆论仍在持续施压,深圳警方介入之初,人们质疑他们会否公正处理;警方有了初步结论后,又有人指责深圳警方不懂法。社会上弥漫着一种“痛打落水狗”的氛围。

林嘉祥必须承担他应当承担的责任,事实上他已付出代价,并还将付出代价。但如果民愤只朝林嘉祥一人发泄,把他打得爬不起来,这个世界是不是从此海晏河清了?有人说,他丢官了,“今后他可没什么嚣张的资本了”。林嘉祥确实没有资本了,但如果没有林嘉祥,钱嘉祥在,他们还会以不同形式一次次重演林嘉祥的嚣张。

现在,案件已经变成一个社会事件,我们应当透过现象,看到事件的本质。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案情单纯。真正引起民愤的是他事后的嚣张。林嘉祥是一个掌握权力的人,是人民公仆,但他极端蔑视主人,将人民的尊严踩在脚下。始于一个治安案件,“成”于权力与主人之间的冲突,折射出一种失衡的政治生态。

如果止于表达民愤,止于“痛打落水狗”,那是很不明智的。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契机,通过一种体制反思,加深对体制现实的认识。目前,我国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必须通过一个个类似事件,审视当下体制弊端,明确改革目标和任务,找到改革的着力点和切入点,使我们的改革取得进展,实现突破。

表面上看,是林嘉祥的口无遮拦、大胆狂言,直接激怒了民愤。据说林嘉祥当时喝了酒,深圳海事局指他酒后胡言,但常常“酒后吐真言”。事实上,林嘉祥确实道出了权力无边、权力支配一切的现实,这犹如当头棒喝,使人们看清了权力不受制约、无法无天的实际。人们体会到,他们对蛮横的权力束手无策,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处于一种被“收拾”的地位。林嘉祥只是权力横行的一个符号,象征了权力与主人冲突的现实。

问题很复杂,道理其实很简单。建设政治文明千头万绪,但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即制约和监督权力。人类漫长的政治史已经向我们揭示,权力天然具有滥用和腐败的倾向,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滥权和腐败。我们的任务是驯化权力,把权力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构建一种新型政治生态。

善治国者必先察乎民情民意,针对林嘉祥的民愤,捕捉和把握理顺社会情绪的契机,开辟改良政治生态的路径。建设政治文明也好,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无非是保障权力来自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

杨于泽

伤害果农的是什么

金秋十月,瓜果飘香,因盛产“平凉金果”的甘肃静宁县喜获苹果大丰收。但记者在静宁县农村果园采访时看到,堆积如山的苹果无人问津,一个月以来,一斤苹果便宜到几分钱也盼不到一个果贩前来收货,行情连洋芋都不如。果农们个个心急如焚。(11月6日《兰州晨报》)

往年这个时候,果农的苹果早卖光了,今年遇到的算是啥事?经济学有个概念,叫丰收悖论,是说某年大自然对农业格外恩惠,农产品丰收了,却卖不上好价格,背后的原理就在于食品缺乏价格弹性,价格下跌并不会使需求增加很多,因而,好收成常常伴随着低收益。但细究起来,静宁县果农遭遇的还不是丰收悖论,或者说与丰收悖论模式不尽相同。丰收悖论之悖总有个限度,一斤苹果便宜到几分钱还没人要,在本地是个蹊跷事。作为供给与需求关系一方的消费者,谁吃过几分钱、几毛钱一斤的苹果?

伤害果农的究竟是什么?有人将狼腿扯到了狗腿上。静宁县果业局的局长王书柱如此分析:静宁苹果销售不畅,是受了金融风暴影响。目前,国内苹果出口

靠出口。现在,出口企业没有一家愿意收购苹果,静宁23万吨苹果全部积压。

此种说法,怎么听都不是个道理。23万吨苹果积压,寻不到国外市场出口,还能寻不到国内市场出口?本土多数城市的苹果市场,还远未饱和和到卖不出去的程度,苹果的卖价好着呢。卖到国外市场是卖,卖到本土市场也是卖,本土市场既然对其他产地的苹果销售都是敞开的,怎么可能对静宁的优质苹果关闭?不是什么金融风暴伤害着果农的利益,而是一些官员的行政不作为伤害着果农。是他们的陈旧思维伤害着果农,是他们的行为惰性危害着苹果丰收。

本土许多城市的苹果都要卖上几元钱一斤,市场那么广大,不难吸纳静宁的那些苹果。苹果卖不出去,不要动不动就往美国的信贷危机上推。金融风暴不是个筐,不是本土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往里装。如果官员能够放下身段,不要坐而论道,而是实实在在地服务于果农,帮果农理顺流通环节,像有些地方所做的那样,帮果农到市场吆喝着卖,就绝不会有那么多的苹果积压,甚至十分可惜地成堆烂掉。

今语

漫画:豪宴嫁女



10月29日,云南昭通永善县公安局右岸分局政委阙隆宽嫁女,在公安局办公大院设宴500桌。

阙隆宽嫁女被当地称为“最牛嫁女豪宴”。阙隆宽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显然知道自己不能如此大操大办,更不能借着嫁女而敛收钱财。

对于阙隆宽的豪宴嫁女,当地监管部门闭上了眼睛,或许他们也正是其中的参与者。也许,在媒体曝光下,阙隆宽会受到处罚,但谁能担保不会出现下一个呢?

文/王军荣 图/吴之如

解释滞留法国不归 不要前后矛盾

上个月突然在法国“失踪”的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民于11月1日回国。据《广州日报》11月5日报道,忻伟民在出国前并未被发现存在贪腐行为,而坊间传言他此次是为情出走。巴黎滞留可能是“私奔”。不过,卢湾区委宣传部在回答采访时称,忻伟民是在国外治疗颈椎病,回上海后仍在继续治疗。至于“与情妇私奔”传言,他们的答复是:无法证实。

与忻副区长被发现突然“失踪”一样,这次他的回国同样让人感到突然——从10月14日忻伟民悄悄地“失踪”,到18天后又悄悄地回来,最先发布消息的居然都是媒体与“坊间”。更不可思议的是,媒体发布了消息后,官方似乎仍然没有及时回应的打算。直至3天后记者主动采访,官方才比较被动地开了金口。

不过,这样的表态再次让人感到突然,它让我产生了三个“想不到”:知道官方会正面解释忻副区长的滞留原因,但想不到原因居然和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湖洪滞留法国如出一辙;想不到,忻副区长身边同事都知道的“情妇”之事,官方居然“无法证实”;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官方对忻副区长滞留法国的解释,竟然是前后矛盾。

如果各位不是那么健忘,应当记得忻伟民当时在法国悄然离开考察团时留了张纸条,称将在法国会友,直至考察团踏上返沪航班,再向忻伟民任何信息。当时的上海官方对忻的突然“失踪”都感到震惊。这些细节,众媒体在10月22日那天都有报道。这意味着官方并不知道忻伟民为什么“失踪”。现在,忻伟民一回国,原因就“找到了”,不知是不是忻伟民回来后才透露的?

如果说官方消息闭塞、反应迟钝,想必是站不住脚的。过往的经验显示,官方对待民间的“谣言”往往反应迅速,用迅速“扑灭”一词可以形容。而在官员的作风与贪腐问题上,官方则往往会表现出极好的耐心与宽容。譬如对于留法不归的杨湖洪,温州方面派出“游说团”劝其回国,无功而返后,要求参与游说的成员封锁消息,不得接受任何媒体采访,违者纪律从事,很有一种保护杨某人的味道。又譬如对待悄然回国的忻伟民,上海有关方面无视公众知情权,对社会各种猜测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解释。

鉴于官方对忻伟民回国的解释漏洞百出,坊间当然会继续猜测。除了“与情妇私奔”版本,网上舆论还有“国内关系已摆平”版、“国外采不下去”版——不知道官方会不会对这些说法按“谣言”处理?希望官方还是花点时间进行调查,再给出一个有“技术含量”的解释吧!这既是对公众负责,也是对“问题官员”负责,更是对政府公信力负责!

椿樾

臧天朔的江湖与恶势力的朋友

说到江湖,我们想起的是弹剑高歌,是快意恩仇,是朋友。想完这些,有个消息等着我们:弹剑高歌《朋友》的摇滚歌手臧天朔因为涉嫌恶势力组织被抓了。

遥想当年,摇滚就是一种力量。在那个摇滚初起的时代,正逢万马齐喑,而风起云涌之时。现在被称为歌后的那几位都是被打击的对象,甚至李谷一用气声唱歌都要被批判的时代,摇滚与牛仔裤、长发、太阳镜,更重要的是与反叛一起,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们所叛逆的是那个时代。

时代的定义有两种,一种是整个时代,无论文化还是政治;一种是文化意义的背叛。在那个时期里,摇滚的力量所冲击的,是整个文化与政治所压抑的氛围。从现在看起来,这使他们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并且造就了最早的,但是对于想要什么还处于朦胧状态的群体。与后来的那些摇滚音乐人不同的是,最早开始这种文化为表面、内里是一种躁动而朦胧者,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而为什么这么做却茫然不知。

世事变迁,在那一代人中间不论是天赋还是后来的修养,有些人最终开始了问一个“为什么”的过程,这里最出色的就是崔健。崔健始终在前进,保持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上看待着音乐以及生活,甚至如同哲人一样思考这个社会。也有人始终没有多少进步,叛逆消遣以后,所留下的不是关于为什么的思考,而是加入到了“江湖”当中。

世情反复,当音乐的梦想不能继续承载其思考时,最开始的那些赋予他们生命力的反叛就会变质,变得更加的江湖与实际。据说臧天朔是圈里“面子最广的人”,这是江湖最大的象征意义。走入其中,利用自己的社会知名度从事某些行业,其实是很正常的事。只是那时候他就不再是个歌者了,而是褪掉其理想主义的音乐外衣,露出当年街头的文身。

世事悲哀也正是在这里啊。一代一代开拓社会无限可能,把美好的东西带给这个社会的人,往往在最初的时候是从直觉开始走上这条路的。而直觉不能长久,在砸了面前坚固的围墙第一下之后,思考为什么砸与怎么砸,以及砸完以后应该如何的人,真是太少太少了。更多的不是从此以叛逆为叛逆走下去,就是当他们赖以成名的某种天赋耗尽时,本色就开始显现。不但中国当年转型期出现的标志性人物多如此,如果我们回望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这种事情也是屡见不鲜。

这也不完全是他们的错,因为在一个没有成熟的社会所出来的人,往往都是如此带着旧时代的烙印。只是在这些年回想起来的时候,那声叹息无可阻止地从嘴边冒出来。偶像的黄昏——是他们自己倒下的。

伍岳